

July 2024

The Historical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A Rur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Zongshuai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Zongshuai. 2024. "The Historical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A Rur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1/20>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历史生成与革命性转换

——农村社会学的视角

张宗帅

摘要:不同于齐美尔、本雅明、阿多诺等人通过对现代城市社会、工业文明的变化的关注来建立各自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布迪厄在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时所运用的概念和理论,是通过对农村社会的变化的密切关注而建立起来的。“惯习”是布迪厄分析文学场和艺术场中的行动特征的最重要的概念,用来解释现代主义文艺潮流中的福楼拜、波德莱尔、马奈等艺术革命的发动者,他们所具备的革命性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从历史和生成的角度看,“惯习”概念是布迪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有关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在法国贝亚恩进行的有关农村受到城镇化冲击出现大量男性单身现象等有关社会转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社会研究中用来解释“惯习”概念的“倾向系统”这一词汇,在布迪厄1999—2000年在法兰西学院进行的关于画家马奈的讲座中反复出现和重新运用,以此来强调行动者的积极主动性及其对于场的变革性因素。

关键词:惯习; 倾向系统; 时间性; 农村社会学

作者简介:张宗帅,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环境人文研究。通信地址:济南市文化东路88号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250014。电子邮箱:1120222454@qq.com。

Title: The Historical Gene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Bourdieu's Concept of "Habitus": A Rural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Abstract: Bourdieu's theories and relevant conceptualizations in analyz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and literary works were formulated based on hi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 Such perspective distinguishes him from Zimmer, Benjamin and Adorno, whose aesthetics and literary theories were formed through their engagemen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urban society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bitu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in Bourdieu's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on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fields, and is used to interpret how the revolutionary actions of Flaubert, Baudelaire, Manet and other pioneers of modernist artistic revolution took place. From a historical and generative perspective, the concept of "habitus" was first proposed in Bourdieu's early rural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which was concerned with the process of peasants' cultural adaptation to urban settlement in Algeria as well as the growing number of single men in rural areas affected by urbanization in Béarn, France. The term "system of dispositions," which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concept of "habitus" in rural social research in the 1960s, repeatedly appeared in Bourdieu's 1999 - 2000 lectures on Manet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t was employed to emphasize the proactive nature of the actor and their transformative impact on the field.

Keywords: habitus; system of dispositions; temporality; rural sociology

Author: Zhang Zongshuai,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Culture Road, Jinan 250014,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Email: 1120222454@qq.com.

一、在阿尔及利亚：“惯习”概念的社会历史情境

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也译作“习性”)概念有其概念史的谱系和哲学史的传统,^①而从历史和生成的视角来看,“惯习”概念是布迪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贝亚恩进行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针对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提出的,用来分析农民进入城镇定居的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农村受到城镇化冲击出现的大量男性单身现象。目前通常的研究结论认为,布迪厄在对法国贝亚恩农民社会危机进行分析的《单身和农民状况》(“Célibat et condition paysanne”,1962年)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惯习”一词,随后又在研究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的《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1963年)一书中再次运用并重构了“惯习”这一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布迪厄对法国贝亚恩的调查和研究开始于1961年,是他在阿尔及尔大学任教期间利用假期完成的,在时间上与他阿尔及利亚社会危机的调查研究有交叉,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从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和完成时间来看,《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②和《连根拔起: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Le déracinement, la crise de l'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n Algérie,1964年)这两本以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最晚在1961年就已经完成,但是“由于这两项研究中隐含的(有时是明确的)政治批判,导致这两项研究直到战争结束后才发表”(Goodman and Silverstein 14),从而使得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时间晚于对法国贝亚恩农民社会的研究《单身和农民状况》。因此,布迪厄“惯习”概念最早的成型和运用是在他对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的研究中。

1955年,25岁的布迪厄被征入伍,被分配到凡尔赛陆军心理服务部任职。布迪厄因反对法国采取军事行动保护法属阿尔及利亚不受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影响,与上司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直接导致他于当年10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以后,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展开的独立战争进行了8年之久(1954—1962年),布迪厄在这场战争的中期进入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残酷和造成的社会动荡(40万人死亡,200万人受影响),使布迪厄获得了关于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现实社会和政治复杂性的直接经验,他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成为自学成才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1957年底,布迪厄复员,在1958—1960年间从事阿尔及尔大学文学部的社会学助理教职,在此期间受到“阿尔及利亚发展基金”^③的资助,以及阿兰·达贝尔(Alain Darbel)领导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研究协会”(ARDES)^④的委派,布迪厄

与他亲密的合作者阿卜杜勒马利克·萨亚德(Abdelmalek Sayad,1933—1998年)在阿尔及利亚对民众的家庭消费和时间预算情况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实地统计调查。这一系列调查,促成了布迪厄与达贝尔、里维特(Rivet)和塞贝尔(Seibel)合著的《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以及与萨亚德合著的《连根拔起: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这两本著作的成型。此外,布迪厄还参与了《阿尔及利亚的不发达状况》(Le sous-développement en Algérie,1959年)报告的编写,写作了《阿尔及利亚传统文明的内在逻辑》《文明的冲突》这两部分。这些以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为主题的学术论文的合集《阿尔及利亚草图》(Esquisses algériennes)于2008年在巴黎塞伊出版社出版。

布迪厄和萨亚德一起穿越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和乡村,在奥兰(Oran)、阿格贝尔(Ain Aghbel)、科尔克拉(Kerkera)、康斯坦丁(Constantine)、马斯卡拉(Mascara)和卡比利亚(Kabylia)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他们不仅进入传统的卡比尔村庄进行调查,还前往经济发展迅速的沿海城市研究外出打工的劳动力移民的生活,以及进入“重新安置”(resettlement)营地进行调查。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出于切断民族解放军的补给、压制当地人抵抗的军事目的,实施了重新安置政策,将山区和边疆地区的农民强行连根拔起,从传统居住地搬迁到平原或城镇的大型安置营地。到1960年,阿尔及利亚的重新安置人口已经到达215.7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重新安置政策导致了普遍的社会失范,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随着战争的进行和重新安置政策的实施,阿尔及利亚乡村传统的荣誉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的自我理想形象都被摧毁了,农民不再对自己的身体习惯和行为方式感到满意,布迪厄运用了“连根拔除”(uprooting)这一比喻性修辞来描述这一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过程。布迪厄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当地人自然而然的、整体性的文化,将调整为后天的、人工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同时代人与不同时代的人身上不断震荡。布迪厄和萨亚德发现,那些与现代化的阿尔及利亚社会相对立的前现代的、传统的农民文化经济,正在遭受由殖民主义和市场经济造成的双重危机。布迪厄试图理解随着欧洲文明和殖民局势的涌入所带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对阿尔及利亚传统农村社会关系以及尚未做好准备的农民的惯习造成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对农民情感经验的“时间性结构”(temporal structures)的影响。

二、时间与惯习:文化震荡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布迪厄注意到,“时间性”(temporality)在这一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体系中,传统的生产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而这种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主要与对待时间的态

度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分析阿尔及利亚农民“与前资本主义经济有关的时间意识的结构”(Bourdieu, *Algeria 1960* 7)。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有关卡比尔(Kabyle)农民及其进入城市劳动的研究中,布迪厄都“赋予时间一个相当大的空间”(法汴尼 252),并试图创立一门有关“时间性倾向的社会学”(une sociologie des dispositions temporelles)。对于时间性问题的关注,与布迪厄自身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1951—1953年,布迪厄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哲学,系统阅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着迷于海德格尔关于时间和历史问题的论述。1954年,布迪厄在法国中部的班维尔中学(Lycée Théodore-de-Banville)担任哲学教师。同年,他在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吉莱姆的指导下写作关于“情感生活的结构”(temporal structures of affective life)的博士论文。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以胡塞尔、梅洛庞蒂、舒茨等人建立起的现象学基础为前提,“惯习由感知的‘视界’(horizons)构成”(Atkinson 5)。现象学重视对时间性问题的分析,现象学的“意向性”分析与时间性过程密不可分。正是这一学术经历,使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特别注重从“时间性”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1963年发表的《阿尔及利亚农民对待时间的态度》(“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 Time”)一文中,布迪厄指出,传统社会中的时间感觉观念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卡比尔农民对时间的体验、对未来的构想是与由土地和季节构成的自然世界融为一体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顺从、与自然节奏合拍,以及“对时间流淌漠不关心的态度”(《卡比尔人的时间观》218)。通过由巫术仪式、神话逻辑所组成的日历,人们的时间经验被塑造成永恒的运动图像和永恒的节奏顺序,“两个连续的时刻可以被看作是由两个对立项所组成的永恒关系,像音乐的感觉一样,社会时间的形式表现为一个连续的秩序,这个秩序只能在时间中完成,并可以还原为一个永恒的逻辑对立系统”(Algeria 1960 27)。这里的时间是不可计算测量的,是由生命生产周期的轮回和昼夜交替所塑造的节奏,并由共同的传统习俗和亲属关系网络所保障。这样一种时间与活动的经验、感官能直接接触及领会的领域联系在一起,对未来的预想和前瞻是出于“对过去的模仿和对传统价值的忠诚”(《卡比尔人的时间观》224)以及最低限度的追求,而不是理性的计算,因而现代工业社会意义上的“未来”在卡比尔人那里是抽象的、不可把握的虚无。

20世纪60年代,由于传统农业的危机和现代劳动力市场的诱惑,阿尔及利亚大约有300万农村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数的一半)放弃了传统的农业劳动和土地进入城镇,期望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但是被前资本主义社会(pre-capitalist societies)所塑造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无产者无法适应现代化、城市化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缺乏“通过普及教育(diffuse education)或正规教育传播的一整套知

识,以及与精神气质结合在一起的实用技能和专门知识”(Algeria 1960 7),最为重要的是缺乏“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要求的那种‘理性惯习’”(布迪厄 华康德 283),即无法获得一种能够实现对未来的时间进行预测、筹划和抽象计算的特定“倾向”(disposition)。这是由于:首先,农业生产周期一般为一年,农业生产的劳动与其成果没有分离,而建立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现代经济的生产周期则较长,且劳动与其成果分离,这就需要精确复杂的计算来想象和适应这一生产周期;其次,现代经济要求将工作看作获取金钱收入的活动,金钱货币是经济关系的普遍中介,而传统的卡比尔农民则拒绝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劳动,而是将工作看作一种活动分工或履行对群体的义务;最后,传统的卡比尔农民表现出对货币交易和现代信用体系的不信任,更习惯于建立在直接的理解基础上的物物交换,因为金钱收付之间的时间差,使其成为“抽象未来的具体象征”(《卡比尔人的时间观》228)。他们无法理解时间的金融价值,如信用储蓄制度和利息概念,很难为了抽象利益而牺牲或延迟眼前现有的触手可及的利益,而是倾向于一拿到工资就将现金转换成衣服、食物等消费品。

正是上述对时间筹划的缺乏,使得进入城市的卡比尔农民无法适应非农业工作的要求,长期处于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状态,如临时工、小时工和小商贩。反过来,“失业和断断续续的就业产生了一种行为的混乱”(Algeria 1960 49),他们既缺乏正常的城市工作所给予的安全感,也失去了“以前由一个整全的社会和一个活的传统所提供的经济保证和心理安全”(49)。正是由于丧失了对生活最低限度的把握,导致进入城市的卡比尔农民用冒险的即兴发挥取代了他们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所获得的行为习惯。他们无法通过计算将现在与未来理性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连贯的时间安排和对未来的期望体系,而是“听任日子一天天度过”(《卡比尔人的时间观》230),时间体验变得更加支离破碎。处于这一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无法完成由传统时间观念向现代测量时间的总体转变,被困在无法重返的传统世界和他们没有能力应对的现代经济体系之间。布迪厄认为,这种困境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如缺乏教育和技能培训,但阿尔及利亚农民却将这种客观的限制归因于自身的不足,将其转换为认知上的自我排斥和悲观宿命论的自暴自弃,开始用支配阶层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对此,布迪厄指出:“每一个社会经济位置都对应着一个围绕着该位置所隐含的与未来的关系而组织起来的实践和倾向系统。这些倾向系统(systems of dispositions)可以同时被描述为按照它们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客观等级来进行分布。”(Algeria 1960 64)其中,“倾向系统”便是布迪厄对“惯习”概念的最早定义和描述,并在布迪厄20世纪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被频繁运用。“倾

向系统”是对客观的经济社会情况的中介和内化,包含了与某一位置相关的未来的客观潜力,它既包括了对当前秩序的顺从,也包括了对当前秩序的反抗。而“倾向系统”所描述的“惯习”这一概念,则用来表示阿尔及利亚农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文化价值、行动倾向,以及他们被抛入的由殖民主义输入的陌生经济世界之间的脱节、差异及其所引发的痛苦。

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学研究中,注意到惯习的“时间性”面向,这直接影响到布迪厄20世纪70年代在《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1979年)一书中对于艺术趣味与时间关系的分析。布迪厄在《区分》中对“趣味”的理解是与对“惯习”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程度上《区分》中的“趣味”与“惯习”可以互换。布迪厄认为,艺术趣味是后天社会性获得的审美倾向系统,它使人们将对象识别为艺术作品并被审美地体验,即“从作品的形式而非功能来考察被指定要如此领会的艺术作品”(《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5),对其美学价值和风格特征进行判断。布迪厄分析了艺术趣味的两种获得方式,并通过与时间的关系将它们区别开来:一是以家庭教育为代表的非正式的、传统的获得方式,这一获得方式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早,需要较长的时间投入,例如培养音乐、绘画等艺术能力,其获得者与艺术趣味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自信的;二是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现代的、制度化的获得方式,这一获得方式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较晚,它主要通过理性话语和标准的分类学(如古典与浪漫的二元对立),将无意识层面的熟习转变为概念知识(如文学史对风格、题材的划分),并灌输给学生,因此只需较少的时间投入就能掌握。布迪厄指出,传统的艺术趣味获得方式具有更大的区分价值,这是由于传统的获得方式与时间之间存在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与时间的关系越密切、久远,艺术趣味的获得就显得越隐蔽、自然,在区分中也越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此外,布迪厄进一步指出,艺术趣味是由纯粹的与不纯粹的、形式与功能等对立项所构成的社会分类的统一体,其中纯粹趣味在艺术趣味中占据统治地位,它遵循着“表现方式绝对高于表现对象”(44)的审美认识方式。纯粹趣味通过不断地拒绝与功能性时间相关的东西来确立自身,要求对时间进行纯粹的投入,例如艺术家经常投入空闲时间生产短时期内没有市场的产品,而不考虑直接的收益。但纯粹趣味并不像它宣称的那么纯粹,而是一种文化投资意识,它推迟对眼前利益的满足,是为了在未来能够获得一种额外的利益。在这里可以看到,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惯习中缺乏对时间的长期谋划和投资相比,艺术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将对时间的谋划投资运用到极致。正是通过“时间性”的视角,布迪厄揭示出“时间”是艺术趣味等级关系区分的根源,建立起艺术趣味与社会历史条

件之间的联系。

三、贝亚恩的单身汉:惯习的身体性及其脱节

稍晚于在阿尔及利亚的研究,布迪厄和萨亚德在1959—1960年开始着手在法国贝亚恩的莱斯奎尔(Lesquire,为化名,实际为布迪厄的家乡拉瑟伯[Lasseube]),展开关于农村单身汉问题的农村社会学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首先于1962年发表在《农村研究》上,论文题名为“单身和农民状况”,在该论文中,布迪厄广泛运用了“惯习”这一概念。后来,布迪厄又围绕着这一研究主题,于1972年在《年鉴》杂志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生殖系统中的婚姻策略》,最后在1989年发表了第三篇论文《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统治的象征性层面》,这三篇文章在2002年合并为《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Le bal des célibataires, Crise de la société paysanne en Béarn*)一书出版。布迪厄将家乡贝亚恩与阿尔及利亚联系在一起,在研究中延续了他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的主题,试图发现二战后法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1945—1975年被称为法国“光辉的三十年”,随着城市化的加速,法国的传统农业衰弱,农民阶层减少甚至消失,农村社会受到现代城市生活的猛烈冲击。在《被禁止的再生产》(1989年)一文中,布迪厄运用了“象征革命”(symbolic revolution)这一概念来概括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贝亚恩地区所发生的剧烈变动:随着经济市场、象征财产市场和婚姻市场的统一,一个原先自在、封闭的农村世界逐渐对外开放,城市的生活和文化模式逐渐蔓延到农村地区,城市的价值观念首先得到农村一部分人的认同——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家中的小儿子——他们更倾向于离开农村去城镇生活。这种个人的认同转变,经过积累最终带来了农村“世界观的集体转变”(布迪厄,《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198) ,即农民价值的象征崩溃——象征革命。在后来的《马奈:象征革命》(*Manet, une révolution symbolique*, 2013年)一书中,“象征革命”成为布迪厄分析艺术场的重要概念,与法国贝亚恩农村发生的象征革命类似,发生在艺术场中的象征革命,质疑了国家机构和艺术学院对艺术价值的集体信仰的垄断权力,产生了对艺术价值的一种新的信仰形式,导致了之前占据主导地位信仰形式和象征秩序的崩溃。在法国贝亚恩农村中所发生的农民价值世界的象征革命,造成了农村大量的男性单身现象。倾向于留守在农村的男性农民仍穿着过时的服装,迈着沉重的步伐,在与女孩交谈时不能掌握像城市男性那样的举止和言语模式,表现出笨拙和羞怯,因而很难吸引到女性。同时,随着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拒绝选择来自偏远小村

庄的男性农民作为潜在的丈夫”(Reed-Danahay 98),从而造成了农村以男性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婚姻交换制度和家庭宗法权威的瓦解,导致了农村大地主家庭中的家产继承人(家中的长子)的大量单身,而在以往的社会中,大地主家长子的单身现象是极为罕见的。在为农村男女提供难得的交往机会的乡村舞会上,城市的舞蹈取代了农村传统节日的舞蹈,单身农民因为难以获得城市现代舞蹈所要求的新的身体动作,而不愿意接近那些在附近城市找到工作了的女孩,并且开始用城市人的眼光来打量自己,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苦恼和不自在。布迪厄在这里使用了“惯习”概念来表示农村人以城里人的眼光所自发感知和体验到的,作为失败者的农民的身体技能和综合特征。“惯习”概念表明了农民的身体动作与社会条件之间的迟滞,表达出农村男子的能力期望与被迫单身之间的创伤性脱节。

与布迪厄在阿尔及利亚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侧重于惯习概念的时间性相比,他在法国贝亚恩进行的农民单身汉问题研究中则侧重于惯习的身体性特征:惯习是对自己身体的感知和展示,是身体即时、瞬间的反应,惯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是后天获得的身体性特质和能力。行动者通过他在物理空间中的身体来意识和体验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这种身体的理解是适合于环境的客观必然的直接领悟(直觉),它所具备的认知结构是在时间和地点明确的社会经验过程中由社会历史构造的,是对别人关于自己所形成的形象的內化。惯习在意识和话语之外起作用,是“被体验到的最自然的东西”(布迪厄,《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91)。与惯习的身体性相关,布迪厄在贝亚恩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还指出了惯习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性:在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社会条件下,行动者内在的行动倾向(惯习),与外在的社会结构完美贴合,呈现为“本体论契合”(ontological complicity)(李楠 90)。但是在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了的“失范”(anomie)情境下,行动者的内在行动倾向并不总是与社会环境合拍,而是表现为与社会结构的脱节、不协调,即“迟滞现象”(phenomena of hysteresis)(Hilgers and Mangez 17)。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的惯习总是倾向于迟滞于社会生活,例如法国贝亚恩农村的单身男性在乡村舞会上对自己的身体动作感到的“笨拙”,阿尔及利亚的进城农民在对时间的谋划上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布迪厄认为,这种迟滞、不协调并不是一种例外状况,而是“惯习运作的必要成分”(法汭尼 247),是惯习的特质之一。

布迪厄在20世纪60年代对贝亚恩农村社会的研究中,对于惯习的身体性以及惯习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结构性落差)的理解,延伸到他在20世纪70年代对艺术趣味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艺术场中的行动者的分析中。在《区分: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布迪厄指出,艺

术趣味作为一种审美倾向系统和文化能力,其传统获得方式直接诉诸身体性的经验,在传统的师徒关系中无意识地领会把握,不知不觉地“熟习”(familiarite)艺术的法则。与之相关,艺术作品是存在于身体运动节奏之中的技艺的产物,是在概念和言语之外传递的“身体之物”(《区分》134)。布迪厄认为,艺术趣味是身体性的,“身体以多种方式体现了等级趣味”(295),身体的仪表姿态、行为举止构成了一个与社会位置系统同源的符号系统。在《马奈:象征革命》一书中,布迪厄提出了“实践美学”(practical aesthetics)的主张:艺术实践是对一门手艺和技能的实践掌握,如艺术作品的上手方式、操作手法,是“基于诀窍(know-how)的实践性认知(practical perception)”(Manet 98),通过无意识的、身体性的对未来的预期指导行动者的行动。艺术创作在实践层面的运作并非通过预先的意图和完全的意识,而是在场域所提供的客观可能下,由一种特定维度的方向感和实践感所引发的对他未曾完全意识到的问题的解决。因此,在《马奈》一书中,布迪厄从实际操作、解决问题等与身体经验的关系的角度,尽可能地重建绘画行动的发生过程,而不是以置身事外或理论沉思的方式将绘画行动看作是现成的、需要阐释的作品。在《马奈》一书中,布迪厄还从惯习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的角度揭示出:与农村社会中农民惯习的迟滞性相比,福楼拜、马奈等文学艺术先锋的惯习则具有超前性,这一超前性的惯习使马奈等先锋艺术家提前感知、探测到艺术场域中能够进行挑战突破的可能性空间,使他们形成了不同于主流文化艺术风格,进而引发了象征领域内的艺术形式革命。

四、农村社会与艺术世界:惯习的革命性转变

在《阿尔及利亚1960》一书中,布迪厄指出“惯习是一个持久的、可转换的(transposable)倾向系统,是结构化的、客观统一的实践的生成基础”(Algeria 1960 vii),在这里,惯习的可转换性指向着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在《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一书中,布迪厄探讨了阿尔及利亚城市中的无产者和背井离乡的农民,他们的“倾向”发生革命性转变的可能性。布迪厄认为,要实现这种革命性的转化,就需要通过固定的就业和固定的工资缓解他们的贫困状况,在尊重他们愿望和意见的基础上,进行教育改革和技能培训,提供公平有效的教育和文化产品,从而建立起适应性的倾向系统,以弥补他们对商业社会的准备不足。尤其是需要实现对时间态度的转变,通过建立开放而理性的时间意识,掌握对未来的筹划能力,最终“实现当地人的自我表达和自决(self-determination)”(Robbins 133)。在《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1964年)一书中,布迪厄认为,可以通过发明一种“合理的教学方法”(布迪厄 帕斯隆 96),来减少在教育和文化上的不

平等现象。布迪厄认为,对于处于被支配地位的行动者来说,通过普遍可获得的教育系统可以实现惯习的革命性转变,为此布迪厄多次参与撰写有关学校教育改革的报告:1981年,布迪厄参加了法国教育改革委员会;1985年,布迪厄撰写了当时的密特朗总统委托给法兰西学院的教育报告《对未来教育的九项建议》;1989年,布迪厄主持出版了《对教学内容进行反思的原则》。在这些报告和和建议中,布迪厄主张发挥教育和文学在象征性斗争中的解放力量,从而摆脱对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盲从。

与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对于惯习的革命性转换的关注一脉相承,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Les règles de l'art, Genèse et structure du champ littéraire》, 1992年)、《马奈:象征革命》等直接与文学艺术有关的著作中,对福楼拜、波德莱尔、马奈等艺术先锋的革命性的惯习(倾向系统)是如何生成的投注了根本性的关注。布迪厄1999—2000年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关于画家马奈的讲座的录音,以及他与玛丽-克莱尔(Marie-Claire Bourdieu)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合作编写的马奈研究的未完成手稿,于2013年被整理出版为《马奈:象征革命》一书。在《马奈:象征革命》一书中,布迪厄重新启用并频繁使用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用来解释“惯习”概念的“倾向系统”(systems of dispositions)这一词汇,并提出了“倾向主义美学”(dispositionalist aesthetics)(Manet 111)的主张。“倾向”是一种内化的统摄和生成能力,能够统摄“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和“结构着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能生成感知、偏好和鉴别力。而“倾向系统”是感知、思考、判断和行动的分类模式系统,产生了人们的实践和各种表达方式,决定了艺术作品的上手方式和实践图式(modus operandi)。倾向系统是行动者接受客观世界结构影响之后进行了“结构归并”(incorporated structures)的产物,因此艺术创作者是艺术场中受到客观结构作用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gents),而非自笛卡尔、康德以来的意向性主体。布迪厄在《马奈》中对“倾向系统”的重新启用,目的在于打破他在《区分》中对于趣味与惯习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他在《艺术的法则》中的“结构分析的惯有框架”(法汴尼 238)。这些原有的论述框架倾向于从“结构同源性”(homologie structurale)、主客体契合等消极方面来阐释惯习。因此“惯习”概念也通常被研究者理解为能够为某一位置带来稳定性,侧重于行动者受到客观结构的限制的被动性,忽视了“惯习”概念所蕴含的变革性。而布迪厄在《马奈》中对“倾向系统”的重新运用,则侧重于行动者与他的社会位置之间的主动性和非协调的一面。“倾向”(disposition)与行动者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中连续占据的一系列“位置”(positions)有关,“倾向”与“位置”之间存在着匹配或者不匹配的关系,而“倾向与位置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往往成为创新的源泉”

(Bourdieu, *Habitus and Field* 73)。从而,布迪厄在《马奈》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式:(倾向+资本)×场=实践,代替了他在《区分》中提出的公式:(惯习)(资本)+场=实践,用“倾向”代替了“惯习”。

在《马奈》一书中,布迪厄对法国先锋派画家马奈的“分裂性”(cleft)的倾向系统进行了分析。马奈的分裂性的倾向系统,使他能将不可调和的事物聚集到一起,这种能力在绘画中表现为对经典作品的“戏仿”(parody)。例如,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年)是对提香、雷蒙蒂、库尔贝等画家作品的戏仿,马奈的《奥林匹亚》(1863年)是对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1538年)的戏仿:传统的裸体画要求画家表现茂密的头发和没有毛发的身体肌肤,表现排除了欲望和性的贞洁、得体、抽象的美,裸女的眼神应该是普遍、抽象、象征的眼神,从而与观众的眼睛保持得体的距离;而马奈的《奥林匹亚》表现了裸女身上的毛发,同时人物又缺少头发,裸女的眼神是挑衅的、率直的,是“面向观众的凝视”(克拉克 181),这样一种眼神使观众感到尴尬。《奥林匹亚》表现的裸女是关乎欲望的,以一种戏仿的方式突破了传统裸体画的艺术惯例,表达了“对裸体画的陈腐语言的讥讽”(179)。布迪厄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具备分裂性的倾向系统,它要求画家对一个艺术象征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及支持其运作的预设十分熟悉。因此,布迪厄指出,倾向系统本身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马奈、福楼拜等具有分裂性的倾向系统的先锋艺术家往往社会出身高贵富有:福楼拜出身于鲁昂的医生世家,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马奈出身于巴黎一个声名显赫的高级政府官员家庭,父亲是司法部的高级官员,母亲来自外交官家庭。较高的社会出身使马奈、福楼拜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能够掌握充足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马奈积极利用了能为他带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关系网络:他举止优雅有风度,与社会上流阶层相处融洽,通过勒约瑟司令(Commandant Lejosne)的沙龙和罗林学院(Collège Rollin)来结识贵族、国家艺术机构的官员、学院派绘画大师,不断积累社会资本;他十分熟悉绘画的历史,不断地向伦勃朗、委拉斯凯兹(Velázquez)、华多(Jean-Antoine Watteau)、戈雅(Goya)以及弗兰德斯画派(Flemish school)的作品学习借鉴艺术技巧。与此同时,马奈也在咖啡馆中与波希米亚知识阶层的画家、记者和小说家来往。马奈处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之间,保持着一种双重对立的关系,不论在大资产阶级的世界,还是在波希米亚人的世界,他都感到身份的尴尬和缺乏归属感。正是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使马奈形成了一种分裂性的倾向系统,成为能力出众的戏仿者,他将绘画本身当作“反身性”(reflexivity)的表现主题,创作出“关于绘画的画”(54),预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论是在对农村社会还是艺术世界的研究中,布迪

厄都试图探讨行动者的惯习(倾向系统)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可能性条件。但是可以发现,福楼拜、马奈等艺术先锋所具有超前性的惯习(倾向系统),与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贝亚恩的农民群体所具有的迟滞性惯习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从而在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中存在着数量较少的艺术先锋,与数量更多的依赖于教育系统的大众群体之间的分离:在教育和文化对普通大众越来越可接触的情况下,布迪厄关心如何发展出一种属于“大众”(masses)的真文化,打破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循环,为普通人提供感知艺术的能力和表达自己的机会,消除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文化剥夺,实现社会的文化平等和均衡发展。布迪厄认为:“在所有的文化生产和艺术生活中——事实上,甚至在行政或政治生活中,或者在像女权主义这样的社会运动中,推动产生创新的主要因素可能部分在于学校系统的深刻变革及其所有后果。”(Manet 180)。因此,布迪厄十分看重由教育系统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形态因素在实现惯习的革命性转换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在《艺术的法则》和《马奈:象征革命》中,布迪厄指出,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随着接受中高等教育的人数激增,教育系统培养了一个新兴的波希米亚阶层和小资产阶级,形成了面向大众和商业的新的文化艺术生产和消费方式,促成了文学艺术摆脱对国家和贵族的依赖,为福楼拜、马奈等艺术先锋实现惯习的革命性转换创造了条件。在这里,社会形态因素(如大众阶层、教育系统)既表现为一种推动性的积极力量,又表现为马奈、福楼拜等艺术先锋需要与之保持距离的限制性因素。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布迪厄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前后“社会艺术”的兴起,出身底层、代表大众的艺术家用细致观察以及“可以说出一切和一切都要被言说”(47),主张发挥文化干预社会政治的功能,以“大众诗人”“工人诗人”和库尔贝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为代表。布迪厄认为,“社会艺术”对占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文化的反抗斗争,是将现有的分类标准和支配性价值观进行简单的颠倒,“赋予被支配者某种贵族身份”(布迪厄 华康德 106),这种斗争确认和强化了合法性的价值利益以及对这种价值的信仰,无法真正实现象征领域的革命和惯习的革命性转变。而马奈、福楼拜等拥有较多社会文化资本的先锋艺术家则通过与大众群体、商业经济和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自主性(autonomy),实现了艺术场的象征革命及其中行动者的惯习的革命性转变。因此,在布迪厄的文学艺术场中,“革命历程中的施为者,从来就不是出身受支配者中居劣势地位者,而是受支配者中居较高位者”(法汗尼 230),在惯习如何发生革命性转变上,与对教育系统及其培育出的大众群体的期待相比,布迪厄表现出对于先锋艺术家的更多倚重。

结 语

布迪厄对于“惯习”概念的时间性、身体性和革命性等层面的源始性思考,发端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对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贝亚恩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学研究,此时布迪厄对于惯习概念的这些层面的探索呈现为未完全解答的状态。这一未解答的困惑一直延续到布迪厄20世纪70年代对艺术趣味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文学艺术场中的行动者的分析中,这一时期布迪厄对惯习的时间性、身体性和革命性进行了深入探索:与阿尔及利亚农民的惯习中缺乏对时间的长期筹划和投资相比,艺术场中的先锋行动者的惯习则将对时间的谋划投资运用到极致;与农村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行动者的惯习的滞后性相比,福楼拜、马奈等文学艺术领域的革命先锋的惯习则具有超前性;在惯习如何发生革命性转变上,与对教育系统及其培育出的大众群体的期待相比,布迪厄表现出对于先锋艺术家的更多倚重。也正因此,布迪厄“惯习”概念中关于艺术先锋的论述占据了相对显眼的位置,而关于拥有较少社会文化资本的农民群体如何发生主体性转变的维度则被长期忽视。重新思考布迪厄的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的“惯习”与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的“惯习”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见证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以中国为例,2021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⑤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工作生活,以工业化、商业化为推动力的城市文明进入乡村,在这一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紧迫问题,农民传统的惯习与现代社会经济所塑造和要求的惯习之间存在着张力。而布迪厄“惯习”概念中的农村社会学面向,正是着眼于进入城市或受到城市文明冲击的农民群体如何建立起适应性的惯习(倾向系统),指出应该在尊重农民的愿望和意见的基础上,提供公平有效的教育和文化产品。这与我国“十四五”期间实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奋斗目标相契合。因此,对于布迪厄“惯习”概念的农村社会学面向的发掘,不仅能够深化对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而且对于中国语境中城乡文明惯习的互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注释[Notes]

① 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1992年)一书中指出,“惯习”概念是他从潘诺夫斯基的两篇法语译文引进的,同时也来自对亚里士多德“素性”(Hexis)概念的重拾。除此之外,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还受到舒茨的“类型化”、韦伯的“理念型”、胡塞尔的“习惯性”(habitualitat)、埃利亚斯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等概念上的启发,以及受到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遵循的哲学上的影响。这里应该对概念史的谱系梳理与概念的历史发生

情境进行区分,布迪厄对潘诺夫斯基、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概念重拾便是从概念谱系上对语汇进行激活,而非对概念所产生的历史情境的追溯。

②《阿尔及利亚的工作与工人》于1977年在巴黎子夜出版社出版了修订版,修订版书名改为《阿尔及利亚60:经济结构与时间结构》,197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英文版,在《阿尔及利亚60》的基础上增补了《荣誉的经济》《住宅或翻转的世界》两篇文章,重新起名为《阿尔及利亚1960》。

③“阿尔及利亚发展基金”是在法国“融合主义”政策的指导下设立的,旨在进行减少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服务改革,并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

④该协会是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在阿尔及利亚的分支机构。

⑤国家统计局信息公开.2022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2022年3月15日<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2/t0220228_1827971.html>.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tkinson, Will. *Beyond Bourdieu: From Genetic Structuralism to Relational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Bourdieu, Pierre. *Algeria 1960*.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Habitus and Field: General Sociology, Volume 2 (1982-1983)*. Trans. Peter Colli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 *Manet: A Symbolic Revolution*. Trans. Peter Collier and Margaret Rigaud-Drayt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皮埃尔·布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Liu 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卡比尔人的时间观》,《时间社会学》,约翰·哈萨德编,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16—231。

[---. “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 *Sociology of Time*. Ed. John Hassard. Trans. Zhu Hongwen and Li Ji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16 - 231.]

——:《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蒋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The Bachelors' Ball: The Crisis of Peasant Society in Béarn*. Trans. Jiang Zhihu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Liu Hu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1.]

皮埃尔·布迪厄 洛伊克·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Bourdieu, Pierre, and Loïc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 Li Meng and Li K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皮埃尔·布迪厄 让-克劳德·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The Inheritors: French Students and Their Relation to Culture*. Trans. Xing Kechao.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提摩斯·詹姆斯·克拉克:《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沈语冰、诸葛沂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

[Clark, Timothy James. *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 Trans. Shen Yubing and Zhuge Yi. Nanjing: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3.]

尚-路易·法汴尼:《布赫迪厄:从场域、惯习到文化资本》,陈秀萍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19年。

[Fabiani, Jean-Louis. *Pierre Bourdieu: A Heroic Structuralism*. Trans. Chen Xiuping.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Co., 2019.]

Goodman, Jane, and Paul Silverstein, eds. *Bourdieu in Algeria: Colonial Politics, Ethnographic Practice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Hilgers, Mathieu, and Eric Mangez, eds. *Bourdieu's Theory of Social Fields: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李楠:《习性:布尔迪厄实践理论路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Li, Nan. *Habitus: Signposts to Bourdieu's Practical Theory*.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9.]

Reed-Danahay, Deborah. “Tristes Paysans’: Bourdieu’s Early Ethnography in Béarn and Kabylia.”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7. 1(2004): 87 - 106.

Robbins, Derek. *The Bourdieu Paradigm: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an Intellectual Social Projec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责任编辑:王嘉军)